

历史编纂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变化都会在历史编纂学中体现出来,并且往往以通史编纂为载体。比如,20世纪初兴起的“国史重写”运动,几乎都贯彻了“新史学”理念——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、以民族国家为叙述范围、以民史取代君史等。在接受西方史学观念过程中,公羊历史哲学、传统民本思想等也都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,这同时又是中国史学特有的“通史家风”的传承。综上可知,近代历史编纂学新格局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模仿西方,而是中西方史学理论和文化观念相互融合的结果,无论是官方修史的延续,还是通史和断代史的编纂,都带有浓厚的本土特色。中国史学的主体性,也并没有因为吸收外来文化而丢失。恰恰相反,随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程度的加深,中国史家越来越强调中国史学的主体性,对争夺史学话语权抱有充分的自觉,并努力构建带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。

##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

### ——以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构建为中心

童 杰 (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教授)

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,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,关于其命名、性质、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。清末,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“浙东学派”概念。<sup>①</sup>民国时期,又有章太炎、傅斯年、陈训慈、姚名达、周予同、张其昀、刘咸炘、何炳松、邓广铭、蒙文通、宋念慈、张寿镛、钱穆、李源澄、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“浙东学派”。<sup>②</sup>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“浙东学派”的研究。纵观“浙东学派”百年学术研究,一方面成果斐然,粲然可观;另一方面,“浙东学派”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,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,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。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,中西史学碰撞、新旧学问争锋,彼此相互渗透、磨合,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。“浙东学派”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,同时,因为“浙东学派”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,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“浙东学派”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——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“浙东学派”为理,沟通中西,改造文明;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“浙东学派”为名,钩沉绝学,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。无论贬斥抑或表彰、谬误抑或精准,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。

① 1904年9、10、12月,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(半月刊)陆续刊载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的第七章“近世之学术(起明亡以迄近日)”,最早提出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。

② 民国时期,关于“浙东学派”的研讨先后出现在章太炎《菴书·清儒》(《章太炎全集》第3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)、傅斯年《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》(《新潮》第1卷第4号,1919年4月)、陈训慈《浙东史学管窥》(《史学》创刊号,1930年12月)、《清代浙东之史学》(《史学杂志》第2卷第5—6期合刊,1931年4月)、姚名达《章实斋之史学》(《国学日报:述学社刊物之一》第2卷第1期,1927年1月;第2卷第2期,1927年2月)、周予同《第四期之前夜》(《一般》第6卷第1—4号,1929年1月)、张其昀《宋代四明之学风》(上、下)(《史学杂志》第1卷第3期,1929年7月;第4期,1929年9月)、刘咸炘《先河录》(刘咸炘:《推广书》,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)、何炳松《浙东学派溯源》(岳麓书社2011年版)、邓广铭《浙东学派探源——兼评何炳松〈浙东学派溯源〉》(《益世报》(天津版)1935年8月29日)、蒙文通《评〈学史散篇〉》(致柳翼谋谄徵先生书)《跋华阳张君〈叶水心研究〉》(蒙文通:《中国史学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)、宋念慈《渊源流长之浙东史学派》(《浙江青年》第2卷第6期,1936年4月)、张寿镛《宋元学案补遗序录》(张寿镛辑:《四明丛书》第5集,广陵书社2006年版)、钱穆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(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)、李源澄《浙东史学之远源》(《史地杂志》第1卷第3期上册,1940年9月)、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)等著名学人的论著中。

### 一、“浙东学派”学术渊源及其提出

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最初导源于“浙东史学”“浙东学术”及“浙东之学”，后几个概念都是清代史学理论大师章学诚提出的。1796年，章学诚痛悼挚友邵晋涵逝世，在《与胡雒君论校〈胡穉威集〉二简》中谈道：“昨闻邵二云学士逝世，哀悼累日，非尽为友谊也。浙东史学，自宋、元数百年来，历有渊源。自斯人不禄，而浙东文献尽矣……而其名不为越士所知。又有黄梨洲者，人虽知之，遗书尚多未刻，曾于其裔孙前嘉善训导黄璋家，见所辑《元儒学案》数十巨册，搜罗元代掌故，未有如是之富者也。又有鄞人全谢山，通籍清华学士，亦闻其名矣，其文集专搜遗文逸献，为功于史学甚大，文笔虽逊于邵，而博大过之，以其清朴不务涂泽，故都人士不甚称道，此皆急宜表章之书。”<sup>①</sup>该信中最早出现“浙东史学”的概念，并指明其学术源于宋元。在史学上，章学诚对邵晋涵寄托了极大的希望，在其逝世之际因未曾将所学传授高徒，亦不曾著书流传，由此哀叹“浙东文献尽矣”，更感慨其名声在绍兴当地不为士林所知。章学诚还列举了黄宗羲与全祖望的事例，说明他们于史学功劳卓著，却鲜为人知，所以亟待表彰。

1800年，章学诚撰成《文史通义·内篇》，其中讲道：“浙东之学，虽出婺源，然自三袁之流，多宗江西陆氏，而通经服古，绝不空言德性，故不悖于朱子之教。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，复与朱子抵牾。戴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，与朱子不合，亦不相诋也。梨洲黄氏出戴山刘氏之门，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，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，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……浙东之学，言性命者必究于史，此其所以卓也……浙东之学，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。故其见于世者，阳明得之为事功，戴山得之为节义，梨洲得之为隐逸，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……或问：事功气节，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？曰：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”<sup>②</sup>此处，章学诚揭示了“浙东学术”从王阳明、刘宗周、黄宗羲、万氏兄弟乃至全祖望“宗陆而不悖于朱”，对于朱熹与陆九渊两派有益思想兼收并蓄的博洽与宏大，其特点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，表现为事功、节义、隐逸、经术、史裁等。此外，他还强调了“浙东学术”重视学术经世致用。章学诚对“浙东史学”“浙东学术”“浙东之学”概念的提出，为后世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构建提供了多个维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依据：此派学者籍贯集中于浙东地区；学术渊源于宋元，延及明清；尊史学重经术；揭示从王阳明、刘宗周、黄宗羲、万氏兄弟到全祖望的学术传承谱系；强调学术经世致用，重视事功与节义。

1904年，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中讲道：“复有浙东学派者，与吴派、皖派不相非，其精辟不逮，而致用过之。其源出于梨洲、季野，而尊史。其巨子曰邵二云晋涵、全谢山祖望、章实斋学诚……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。”<sup>③</sup>这一论述，其一，辨析了浙东学派与吴派、皖派的区别与短长；其二，强调了浙东学派尊史的特点；其三，勾勒了从黄宗羲到章学诚的学术谱系；其四，表达了梁氏个人对浙东学派的推崇。1923年，梁启超再次讲道：“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，其派复衍为二。一为史学；二为王学。”<sup>④</sup>进而强调浙东学派以史学与经学为卓著的特点。1916年，章太炎

① 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703—704页。

② 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121—122页。

③ 梁启超：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24—125页。

④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5页。

在论析清代学术之际时谈道：“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，万斯大、斯同兄弟，皆鄞人，师事余姚黄宗羲，称说《礼经》，杂陈汉、宋，而斯同独尊史法。其后余姚邵晋涵、鄞全祖望继之，尤善言明末遗事。会稽章学诚为《文史》《校讎》诸通义，以复歆、固之学，其卓约过《史通》。而说《礼》者羈縻不绝。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，始与皖南交通。其子以周作《礼书通故》，三代度制大定。”<sup>①</sup>相较于梁启超的论述，章太炎论“浙东之学”的学人谱系下延到了舟山黄式三、黄以周父子。1919年，傅斯年撰文总结清代学问为“四派五期”：第一是朴学派，第二是今文学派，第三是理学派，第四是浙东学派。傅氏认为浙东学派“有黄梨洲、万氏兄弟、全谢山、章实斋等。他如王船山、陈兰甫诸君虽然不能算浙东学派，可是就学问的性质上分来，有非常相同之点，很当以类相从，归成一派”。<sup>②</sup>傅氏以宏阔的视角俯瞰清代学术，将浙东学派定义为四大学派之一，并认为王夫之、陈兰甫的治学之道亦与浙东学派趋同，无疑对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阐释与理解起到了认同之认同的强化效果。

## 二、“浙东学派”的构建及辨正

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，陈训慈、姚名达、周予同、张其昀等人在梁启超、章太炎、傅斯年开辟的理路上对“浙东学派”予以阐释、补充。迨至1932年何炳松《浙东学派溯源》出版，最早系统论述了“浙东学派”。何炳松主张给宋以来的浙江学术确定“一定的地点和名称”，他在序言中讲道：“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，实以程颐为先导。程氏学说本以妄与怀疑为主，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相近……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己、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、陈亮等，实创浙东永嘉、金华两派之史学，即朱熹所目为‘功利之学’者也。金华一派又由吕祖谦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胡三省等史家之辈出，金华本支则曾因由史入文，现中衰之象；至明初宋濂王祙、方孝孺诸人出，一时乃为之复振……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。适明代末年，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‘左袒非朱，右袒非陆，’……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，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、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、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；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，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，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，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，实足竞爽。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。”<sup>③</sup>何氏将“浙东史学”等同于“浙东学派”，主张南宋“浙东史学”的学术精神源于程颐，并勾勒南宋永嘉、金华两派史学传承程学迄于元代延及明初，以及明末刘宗周开端绪，衣钵传至清初黄宗羲，进而蔚成宁波万斯同、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、章学诚等两个时期浙东史学派的谱系。这个分期影响很大，后来学者虽有不同见解，但其启发与借鉴之功不可磨灭。

此外，何炳松关于南宋“浙东史学”以程颐为宗主的立说不失为独到见解，然而学理支撑上有所欠缺。1935年，邓广铭撰《浙东学派探源——兼评何炳松〈浙东学派溯源〉》予以辩驳：“南宋因朱子之出而理学集厥大成，理学的气焰遂压倒一切；因而朱子推尊尹洛，尹洛之学的权威亦遂大定。并时而起的一切学术，文史功利莫不在被排斥之列，于是一般人只以厕身理学之林为荣，外此则全为卑俗之学而不足以向世人夸耀。其不甘向风而靡者唯有浙东诸人，而后之论者却又多方代为攀附，将他们也列为道统中人，对其学问的主体所在抛开不管，对其所从出的源泉更有意地加以掩饰。这种态

① 章太炎：《章太炎全集》第3册《廛书重订本》，朱维铮校点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57页。

② 傅斯年：《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》，《新潮》第1卷第4号，1919年4月。

③ 何炳松：《浙东学派溯源》，岳麓书社2011年版，第3—4页。

度,在现时的我们绝不应再行因袭,而何炳松先生却是不唯因袭了而反加甚。以集理学大成的朱子,其批评浙东之学为舍本逐末自属应尔,我们如能抛去理障与道统之见,则单是他们在功利之学一方面的成就已足使他们卓然成家,何况在文史方面都还有更深湛的造诣。又何必怀着主奴的成见而代为洗白、掩饰、厚诬古人以其不肯为不屑为的事呢。”<sup>①</sup>此文正本清源,循名责实,直击南宋“浙东学派”以程颐为宗主说转相攀附的要害,并道明了南宋“浙东学派”坚守宗旨,不为道统所折服的清高学品。撇开学理上的孰是孰非,这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何炳松与邓广铭之间关于“浙东学派”的学术辩论,极大刺激了当时及后来研究者对“浙东学派”的关注与研讨。

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,蒙文通、宋念慈、张寿镛、钱穆、李源澄、金毓黻等相继对“浙东学派”进行研讨,在分期、性质、内涵上各有不同的见解与研究。特别是金毓黻于1944年提出:“或以章学诚生于浙东,于《文史通义》中著有《浙东学派》一篇,因谓史学为浙东所独擅,此似是而非之论也……浙东人研史之风,元、明之世本不甚盛……观黄宗羲承其师刘宗周之教,而导源于王阳明,盖与宋代吕、叶、二陈绝少因缘,其源如此,其流可知。万斯同固亲承黄宗羲之教矣,全祖望私淑黄氏,续其未竟之《学案》,亦不愧为黄氏嫡派,至于章、邵二氏,异军特起,自致通达,非与黄、全诸氏有何因缘,谓为壤地相接,闻风兴起则可,谓具有家法互相传受则不可。”<sup>②</sup>金毓黻指出了此前民国学者“浙东学派”构建的三个要害:其一,“浙东学派”的学人擅研史学,但不表示史学为浙东学者独擅;其二,南宋“浙东学派”与明清“浙东学派”之间在学缘上没有传承,中间的宋元之世研史风气比较淡薄;其三,明清“浙东学派”内部,黄宗羲与万斯同、全祖望是师徒关系,与邵晋涵、章学诚则没有师承关系,仅以宁波、绍兴两地接壤,将两地治史学者拢为一个学派,实为偏党之见。

### 三、史学近代化视域下的“浙东学派”

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,梁启超在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,期间还奔走于夏威夷、南洋、澳洲、美洲等地,他采风问俗、体察各地政情与历史,并结合阅读大量日文翻译的西方史著,酝酿了革新传统史学的不朽理性与激越情感,所谓“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,随感情而发”。<sup>③</sup>《中国史叙论》与《新史学》相继在1901年9月、1902年2月发表,梁启超倡导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书写中国通史,并批判中国的旧史存在“四弊二病”。梁启超自况“新思想界之陈涉”,<sup>④</sup>为了破旧立新不惜用卤莽疏阔的手段矫枉过正,某些论述虽失之于偏激,然其“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,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圉”的坚毅与勇锐,<sup>⑤</sup>确乎起到“烈山泽以辟新局”之效,<sup>⑥</sup>并由此立起了“史界革命”的大旗。“浙东学派”正是在梁启超号召“史界革命”背景下提出的,民国时期章太炎、傅斯年、陈训慈、何炳松、张寿镛、钱穆等众多学者多从肯定的立场表彰“浙东学派”,这与该学派强烈的民族意识、重视事功与节义、倡导学术经世致用、尊史重经、重视文献搜集与整理、重视近代史书写、不持门户之见、贵专家之学、文以适用等特点有紧密的关系。究其原因,主要有以下几点。

① 邓广铭:《浙东学派探源——兼评何炳松〈浙东学派溯源〉》,《益世报》(天津版)1935年8月29日。

② 金毓黻:《中国史学史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第352—353页。

③ 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,第206页。

④ 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第206页。

⑤ 李大钊:《青春》,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1号,1916年9月。

⑥ 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第206页。

第一,“浙东学派”强烈的民族意识、倡导学术经世致用、重视事功与节义的特点,在清末、民国初年特殊时代背景下,受到仁人志士的重视。清末,梁启超、章太炎等人的学术研究与革命活动直接关联,章太炎提出“用国粹激动种姓,增进爱国的热肠子”。<sup>①</sup>“浙东学派”的开山人物黄宗羲是明末东林党人后裔,受其父黄尊素的影响,重廉耻尚气节,明亡之后曾组织义军抗击清军。在清朝政权巩固后,黄宗羲退隐家乡设馆讲学,康熙帝屡次以礼征诏,皆以老病疏辞,拒不仕清,始终坚守明遗民立场。黄宗羲嫡传弟子万斯同同样很有民族气节,早期一直拒绝与清廷合作。后因修撰明史事关人物毁誉与历史评价,在黄宗羲的要求下,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,不属衔、不受俸,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416卷《明史稿》,梁启超盛赞:“清代史学极盛于浙,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……其以独力成《明史稿》,论者谓迁、固以后一人而已。”<sup>②</sup>继黄宗羲、万斯同之后,全祖望大力表彰故国忠义,旨在“大阐幽德”,发扬民族正气,其《鮑埼亭集》收录了大量神道碑、墓志铭、行状等记述抗清义士及明遗民的内容,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史料。五四运动前后,抱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傅斯年也注意到了“浙东学派”,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与经验智慧。九一八事变后,傅斯年针对日寇与汉奸企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恶劣舆论,发表《中华民族是整个的》,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,从理论上予以有力反击,展现了书生报国的一腔热忱,与历史上“浙东学派”强烈的民族意识、倡导学术经世致用、重视事功与节义的品质若合一契。

第二,“浙东学派”重视文献整理、经史并重的学术理路,特别是章学诚提倡“六经皆史”的理念,契合民国时代“整理国故”活动的需要。民国建立后,读经被明令禁止,经学虽然变成了死亡的学问,但并未淡出人们的视野,在当时社会各个阶层还有相当深厚的基础。“浙东学派”重视史学,也有重视经术的传统,章学诚于1788年给孙星衍的信中写道:“愚之所见,以为盈天地间,凡涉著作之林,皆是史学,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。”<sup>③</sup>此外,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上》篇首提出:“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,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,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<sup>④</sup>胡适将“六经皆史”阐释为“六经皆史料”,虽有所曲解,但客观上为当时社会上大量认同尊孔读经的人创造了条件。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“整理国故”活动方兴未艾,“浙东学派”六经皆史的学术理路与重视文献整理的传统,同样与之契合。1923年,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的演讲中指出:“第一条路,便是近人所讲的‘整理国故’这部分事业。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又且最有趣的,便是历史,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……但即以现存的正史,别史,杂史,编年,纪事本末,法典,政事,方志,谱牒,以及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,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,拿历史家眼光看来,一字一句,都藏有极可贵的史料,又不独史部书而已,一切古书,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,拿他当历史读,都立刻变成有用,章实斋说‘六经皆史’,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;但从历史家立脚点看,说‘六经皆史料’,那便通了。”<sup>⑤</sup>顾颉刚也谈道:“我始终认清一个目标,知道他们治经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,乃是正要促经学的死亡,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,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。”<sup>⑥</sup>

第三,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了《新史学》,何炳松于1912年译述了鲁宾逊《新史学》,作为“史界

① 章太炎:《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》,姚奠中、董国炎:《章太炎学术年谱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,第97页。

② 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第147页。

③ 章学诚著,仓修良编注: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721页。

④ 章学诚著,仓修良编注: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1页。

⑤ 梁启超: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——梁任公先生为东大国学研究讲演》,《时事新报》(上海)1923年1月23日。

⑥ 顾颉刚:《顾颉刚自传》,顾颉刚:《宝树园文存》卷6,中华书局2011年版,第413页。

革命”“新史学”的倡导者,不约而同地大力表彰代表传统史学的“浙东学派”,足可见该学派蕴含了契合新时代学术文化建设所需的与时迁移、应物变化的非凡内涵与优秀特质。此外,民国时期皇朝体制被推翻,国史馆与清史馆虽被保留下来,但因无法融入新的政治体制与时代文化,官方掌控史学的权力留出了真空,私家修史的空间增大。在新史学的影响下,民国史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清史纂修,学术史、文化史、社会史、交通史等都受到重视与认可,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、章太炎《馗书·清儒》、钱穆《国学概论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等有关清代学术史的优秀史学著作相继出现,这些分析清代学术史的作品,无一例外地讲到了“浙东学派”,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,梁启超热情激昂地表彰“浙东学派”：“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、万季野,而昌明于章实斋……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,清代史学界之耻也!”<sup>①</sup>1920年,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发表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,亦引起了民国学术界对章学诚的关注,胡适、姚名达等先后撰文表彰章学诚的史学,作为“浙东学派”学人谱系中的重要人物,间接地推动了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传播、接受与使用。

### 结 语

20世纪初,梁启超慧眼卓识最早提出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,并界定了该学派基本的谱系、内涵与特点,因其代表人物黄宗羲、万斯同、全祖望、邵晋涵、章学诚皆为有清一代最为卓越的史学家,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、倡导学术经世致用、重视事功与节义、不持门户之见、贵专家之学等优秀的学术品格,从而引起了众多民国学人的关注,并参与“浙东学派”的构建中。“浙东学派”的学人谱系,从最初清代“浙东学派”推衍为南宋“浙东学派”,其重视经术、重视史学精神的坚守和经史要义的阐发等朴实学风被进一步发掘。“浙东学派”史学大家所秉持的坚定的文化担当与传承意识,特别是师生传承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经史学学脉,不仅造就了浙东经史学源远流长的特色,同时也为其后续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,在坚守中传承,在传承中创新。“落其实者思其树,饮其流者怀其源”,民国时期在中西思想冲突、新旧学术矛盾的文化背景下,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提出,起到了融会多元、贯通并包的作用,很好地提炼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精髓,诠释并厘清了以浙东经史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。

(责任编辑:张舰戈)

(责任校对:苑 苑)

<sup>①</sup> 梁启超: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,第297页。